

试论吐蕃文化对于阆皇后凤冠的影响

张聆潇 龙慧娴 高梦园

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8

【摘要】：曹氏画院时期，敦煌壁画中于阆皇后供养人佩戴的凤冠造型特征鲜明，已有的研究学者认为其受中原影响，但笔者认为吐蕃对其的影响大于中原，本文通过图像学、考古类型学、历史文献分析法，对比于阆皇后凤冠与吐蕃出土王冠实物，并结合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需求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吐蕃自象雄时期就有“鸟崇拜”，与王权相关，至佛教传入吐蕃，妙音鸟的形象与琼鸟相结合，敦煌时期，又与凤鸟形象相结合并用于王冠之上代表王权，中原地区在宋代才正式将凤鸟写入首服制度，因而吐蕃对于阆皇后凤冠的影响大于中原。

【关键词】：于阆皇后；凤冠；吐蕃；中原；服饰文化交流

DOI:10.12417/3041-0630.26.05.101

于阆，位于今丝路南道的和田，以盛产美玉而著称，是唐朝安西四镇之一。《旧唐书·于阆国传》记载其“西南带葱岭，与龟兹接，在京师西九千七百里，胜兵四千人”^[1]在执掌归义军军政大权之初，曹议金为了在河西走廊构建稳固的政治战略屏障，特意通过和亲手段将其女儿册封给于阆国君主李圣天。这一政治联姻，不仅平衡了边疆势力，更成为了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融合的关键纽带。敦煌石窟壁画中经考证可确认属于于阆皇后的供养人形象共计七身，有四身是与于阆国王李圣天一起出现的，分别在莫高窟第4、98、454窟和榆林窟第31窟。^[2]凤冠作为政治联姻的视觉符号，反映丝路政权间的文化交流，其形制可揭示于阆本土审美与敦煌汉风、吐蕃遗存的交融。

凤鸟是中华上古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祥瑞符号，早在商周两代，便已作为经典纹饰镌刻于青铜礼器之上，至秦汉时期，其形象又持续演化，在画像石、瓦当等各类器物纹饰中均能寻见踪迹。到了魏晋南北朝阶段，随着佛教在中原大地的盛行与传播，凤鸟被赋予了新的宗教内涵，其文化寓意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因而谈到凤鸟的形象，大众普遍认为中原文化占主导地位，然而本次的研究对象于阆皇后凤冠，究其源流，笔者有了新的发现。据目前的研究表明，西藏地区在吐蕃政权之前没有发现过凤鸟的形象，吐蕃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对外扩张，才传入吐蕃。由目前出土实物可知，吐蕃王朝中的凤鸟多与权力相关。同时期的盛唐，凤鸟并不代表女权，宋代才将凤鸟正式写入礼服制度，本文将从图像学以及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并结合政治、经济和文化，对于阆皇后凤冠展开具体分析。

1 吐蕃王冠的源流

1.1 吐蕃地区的“鸟崇拜”观念

象雄是吐蕃王朝崛起前扎根于西藏高原的古老文明，其孕

育的苯教文化为后世西藏文化的发展烙下了深刻印记，这一文明最终被崛起的吐蕃政权征服并融入其文化体系之中。古代象雄诸王以及苯教著名法师们，为区分不同等级的王权（或神权），有头戴形如琼鸟之角、材质多为黄金、绿松石、琉璃、天生铁、水晶、珊瑚等王冠（或法冠）的习俗，这是象雄文明的标志性文化特质之一^[3]。

《白扎穹布世系水晶宝鬘》和《穹布王统史白水晶明镜》中有关于“穹”氏族的起源及其后裔繁衍的记载，“穹”氏族在象雄王国里代表着苯教祭司，象雄雍仲苯教在吐蕃迅速发展时，“神鸟穹”的图腾崇拜也为吐蕃所接受，如P.T1287《赞普传记》载，止贡赞普死后，悉补野之子阿列吉赎回赞普之尸骸的代价，就是一个目如鸟目的女子^[4]，神话故事虽不可全信，但可从中窥见吐蕃的“鸟崇拜”。

五代敦煌石窟中存在大量金翅鸟的图像，敦煌金翅鸟图像中的全鸟形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以盛唐为界限，盛唐之前的全鸟形金翅鸟形象偏向鹰形，盛唐及其之后，金翅鸟形象更加偏向凤鸟的形象。^[5]

1.2 吐蕃王冠及突厥金冠分析

2019年敦煌研究院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特展中，展出过两件吐蕃王朝时期（608—866年）的凤鸟纹鎏金银饰片。策展方对其凤鸟造型特征作出详细解读：整只凤鸟由三叶形冠羽、卷曲状尾羽及颈部蛇鳞状羽毛构成，其中颈部的蛇鳞状羽毛是最具辨识度的视觉特征，且每只凤鸟均以莲花为底、伫立其上，器物整体呈现出椭圆形的轮廓形态。

作者简介：张聆潇(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丝路沿线服饰文化研究。



图1 普利兹克收藏的风纹鎏金银饰片

图(引自《敦煌时期艺术珍品》)

该风鸟纹鎏金银饰片的具体用途虽尚未有定论,但饰片上的小孔径推测为绿松石脱落遗留的孔洞与固定铆钉所用。笔者还发现了一件吹笙伽陵频迦鸟饰片。这件饰片与前述风鸟纹鎏金银饰片相较,仅核心的主题形象不同,其余如鸟身、羽翼等部位的造型设计与制作工艺,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伽陵频迦鸟是佛教语境中佛国世界的经典神鸟,《正法念处经》卷六十四中对其有明确记载:“出妙音声,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而这两件饰片在工艺与造型上的高度契合,也直观印证了多元文化在吐蕃地域的碰撞、融合与发展脉络。



图2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8世纪鎏金王冠

图3 吹笙伽陵频迦鸟饰片(芝加哥私人收藏)

蒙古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出自毗伽可汗陵的突厥金冠(见图4)中,能清晰看到立体凤鸟造型已融入冠饰形制之中。突厥作为吐蕃彼时的同盟政权,这一实物遗存颇具研究价值;尽管同期吐蕃境内尚未出土带有立体凤鸟造型的王冠文物,但结合这件突厥金冠的发现,再对照象雄时期关于琼鸟之角冠饰的文献记载,足以形成立体凤鸟形象应用于西域王权冠饰的有力佐证,同时也与莫高窟98窟于阗皇后风冠的图像资料形成了实物与图像的相互印证。



图4 蒙古国家博物馆藏毗伽可汗陵出土突厥金冠

2 于阗皇后风冠图像梳理

2.1 于阗皇后风冠分析

98窟的于阗皇后风冠为双层仰莲风冠,其核心造型由莲座与凤鸟两部分构成,具体形制为在顶髻之外套置双层仰莲座,莲座之上站立一只展翅翘尾、欲飞的凤鸟。莲花作为佛教的核心象征符号,是佛祖诞生的标志,代表“净土”,也成为佛教艺术中最主要的装饰题材。将莲花座置于头顶的造型,推测受到佛教“顶严”观念的影响,在佛教造像中,莲花常作为佛菩萨的座具,象征清净与超脱,于阗皇后风冠将莲花座与凤鸟结合,既体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暗含着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威的统一。物质文化与工艺层面,于阗皇后风冠则融入了中亚奢侈品工艺特征,于阗本土以盛产玉石闻名,而吐蕃出土大量金银器所采用的绿松石镶嵌工艺,与于阗皇后风冠的工艺技法同源,成为二者文化交融的直接体现。



图5 莫高窟第98窟主室东壁门南侧 于阗皇后画像(局部)

图6 莫高窟第61窟主室东壁门南

2.2 图像学对比结论

关于青海都兰吐蕃金银器的风格,许新国提出:“都兰金银器中的凤鸟图形,头、颈、身尾均装饰忍冬花纹,而在同期唐代金银器的立凤纹中则不见;都兰的立凤嘴衔忍冬花纹,颈后饰忍冬花纹,而在唐代同类图像中未见;翅膀上带有联珠纹饰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风格也不见于同期唐代金银器。此外,都兰的动物纹具有异域风格;浮雕效果和唐代线刻也存在着差异。”^[6]

首先,在凤鸟的形制特征上,吐蕃的王冠上以及突厥金冠上的凤纹与于阗皇后上的凤鸟形象同为展翅翘尾,意欲飞翔的凤鸟,脚踩莲花底座,翅膀张开的轮廓一致,绘制的羽毛层数一致。凤纹的刻画都带有异域的风格。同时期中原的凤纹更加内敛柔和。突厥金冠上立体凤头及身体的出现与98窟的立体凤冠形象类似,吐蕃王冠的结构,高浮雕工艺以及绿松石的装饰作用,都与61窟于阗皇后风冠如出一辙。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同时期的唐代,风冠并未成为权力的象征出现在皇冠之上。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可知吐蕃对于阗皇后风冠的影响大于中原。

3 吐蕃对于阆皇后凤冠影响大于中原的成因讨论

3.1 吐蕃对于阆皇后凤冠的影响

吐蕃对于阆的实际控制期约为791-850年,荣新江在《归义军史研究》中提到,最晚至850年,于阆尉迟氏王室实现复国,重新掌握政权。在吐蕃统治于阆的阶段,结合吐蕃与于阆的文书记载可看出,吐蕃在于阆的统治体系大体沿用了唐代的制度框架,在服饰制度上也基本承袭唐统治于阆时期的规制,但在冠饰与服饰的局部细节上,融入了吐蕃的统治等级制度特征,以此象征并彰显吐蕃对于阆的统治权。

此外,吐蕃退出西域后,于阆与吐蕃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珍贵材料的流通与工艺技法的交流,对于阆皇后凤冠的制作工艺、材料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形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各地区的文化特征,形成了多元交融的造型特点。而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8世纪中期)暗格出土的鎏金冠饰上的凤鸟形象,进一步印证了凤鸟形象在吐蕃文化中作为权力象征的内涵,也为吐蕃文化对于阆皇后凤冠的影响提供了实物佐证

3.2 凤冠成为权力象征的时间先后顺序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皇后祔衣所配首服为:“祔衣,首饰花十二树,并两博鬓。《旧唐书·舆服志》的编纂时间为940-945年,处于中原五代(公元907-960)时期,也是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曹元忠执政期间(公元944-974年)由此可知,于阆皇后的凤冠与唐制的首服制度并不相同。由唐代出土的陶俑、传世作品、墓室以及石窟壁画,少有见佩戴凤冠者,然而敦煌地区的壁画中,却大量出现。

“凤冠”作为首服,直到唐代才出现,为舞伎所戴。如《旧唐书》卷二九云:“天授乐,武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画衣五采,凤冠。”《新唐书》卷二二云:“又作光圣乐,舞者鸟冠、画衣,以歌王迹所兴。”根据《乐书》可知,此处的“鸟冠”也

被称为“凤冠”,书云:唐明皇造光圣乐舞,舞者八十人,凤冠,五采画衣,兼以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业所兴也。可见,唐代宫廷舞伎在跳“天授乐舞”和“光圣乐舞”时,头上戴的是凤冠。此处需要特别区分凤钗与凤冠的区别。张彬学者在《冠作鸟象——唐代女子首服“鸟冠”考释》中认为鸟冠的佩戴人群是乐舞伎和侍女,历唐之世,凤冠并不是女子的权力象征。

《宋史·舆服志》的记载,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赵匡胤命礼官重新制定皇后服制时,首次将“龙凤花钗冠”正式纳入皇后受册、朝谒景灵宫等重大典礼的礼服制度中。具体记载为:“皇后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冠饰以九龙四凤,服祔衣。”可见此时凤冠为皇后受册、朝谒太庙、景灵宫等国家级典礼的标配首服,与“祔衣”配套使用,成为宋代皇后最高等级礼服的标志。

宋代《舆服志》将凤冠正式纳入后妃命妇礼服体系,而敦煌五代至宋初的供养人画像中,女性凤冠已广泛流行。根据时间线,可得出吐蕃对于阆皇后凤冠的影响。

4 结语

98窟于阆皇后的双层仰莲凤冠,作为政治联姻的视觉符号,反映丝路政权间的文化交流,其形制差异可揭示于阆本土审美与敦煌汉风、吐蕃遗存的交融。于阆皇后的双重身份,使凤冠造型的来源有了更加丰富的判断来源。吐蕃的王冠上以及突厥金冠上的凤纹与于阆皇后上的凤鸟形象同为展翅翘尾,意欲飞翔的凤鸟,脚踩莲花底座,翅膀张开的轮廓一致,绘制的羽毛层数一致。凤鸟的刻画都带有异域的风格。同时期中原的凤鸟形象更加内敛柔和。突厥金冠上立体凤头及身体的出现与98窟的立体凤冠形象类似,吐蕃王冠的结构,高浮雕工艺以及绿松石的装饰作用,都与61窟于阆皇后凤冠如出一辙。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同时期的唐代,凤冠并未成为权力的象征出现在皇冠之上。中原地区在宋代才正式将凤鸟写入冠服制度,因而吐蕃对于于阆皇后凤冠的影响大于中原。

参考文献:

- [1] 《旧唐书》卷一九八,中华书局,第5305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于阆传》同.
- [2] 陈菊霞,李珊珊.于阆国王李圣天供养人像及其相关问题[C]//《文津学志》编委会.文津学志(第十五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
- [3] 参见:洛追热萨主编《古代象藏词典(藏文版)》,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4页;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 [4]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86.
- [5] 宋晗丽.敦煌金翅鸟图像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3.
- [6]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4期,38页.
- [7]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4.